



E-ISSN: 2976-2421 (Online)
CODEN: JRAOCQ

DOI: <http://doi.org/10.65098/jra.02.2024.77.87>

REVIEW ARTICLE

西伯利亚阿穆尔河下游岩画传统的连续性

伊琳娜.A.波诺马列娃¹著, 茜琳²译, 肖波³校

¹格里菲斯大学黄金海岸校区, 南港 4222, 澳大利亚

²莱斯特大学, 莱斯特 LE17RH, 英国

³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南宁 530006, 中国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CC BY 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RTICLE DETAILS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21 September 2024

Accepted 23 October 2024

Available online 27 November 2024

ABSTRACT

本文探讨了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流域下游（俄罗斯远东地区）岩画传统与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性问题。本文旨在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和岩画资料的进展，重新考虑既定的年表。该研究人员之前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只考虑了人面像的设计，但在本文中，还对动物图像进行了研究。通过人类学关于民族、身份、社会实践、象征意义和社区的思考方法，对最近发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岩画传统模式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

阿穆尔河, 新石器时代岩画, 文化传统, 俄罗斯远东地区

1. 引言

阿穆尔河下游始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终于阿穆尔河入海口，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是一个特定的考古文化区（Popov 1969; Okladnikov and Derevyanko 1973; Popov 1969）。

阿穆尔河下游的岩画以6个岩画群为代表（图1）：阿穆尔河畔的锡卡奇—阿梁、奥日（马依地区）、卡利诺夫卡，以及阿穆尔河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谢列梅捷沃、基亚和苏克派。主要的岩画群是锡卡奇—阿梁综合体，在其6个岩画点中共记录了约300幅图像；而谢列梅捷沃岩画群包括3个岩画点，共约30幅图像。基亚岩画群包含3个岩画点共计13幅图像，而卡利诺夫卡岩画点仅发现1块带有岩画的石头，上面有15幅图像（图2; Okladnikov 1971, 1981a; Laskin 2015a）。奥日和苏克派岩画被认为属于中世纪时期和铁器时代（分别为公元8至10世纪和公元前1千年中期至公元1千年中期）（Okladnikov 1971; D'yakov 1978），在此不予考虑。

锡卡奇—阿梁其中的4个岩画点沿阿穆尔河左岸分布，这里集中分布着带有岩画的独立花岗岩巨石，另外2个岩画点位于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上。谢列梅捷沃岩画群中的2个地点位于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上（图3），而其他4个地点的岩画位于独立的巨石上。基亚岩画的所有图像都位于一块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上（图4）。

19世纪末，阿穆尔岩画开始为公众所知，并立即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1898 至1899年，美国研究人员贝托尔德·劳弗尔和杰拉德·福克对阿穆尔河下游盆地进行了考察，并报告说他们参观了岩画（Laufer 1899; Fowke 1906）。随后，探险家弗拉基米尔·K.阿尔欣耶夫（Vladimir K. Arsenyev）于1908年、民族学家列夫·斯滕伯格于1910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于1919年考察了锡卡奇—阿梁岩画点。由于对西伯利亚其他

地方的岩画进行过深入研究，因此，斯滕伯格对阿穆尔岩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Okladnikov 1971）。

N.G.哈尔拉莫夫首次尝试对锡卡奇—阿梁主要岩画点进行历史解读，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岩画点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带有图像的巨石是一座古城和宗教中心的遗迹。哈尔拉莫夫将这座城市称为“加尔布”（“Gal’bu”），并将其归属于公元前1千年至公元1千年时期。苏联民族学家亚历山大·M.佐洛塔廖夫在研究乌尔奇人时提到了锡卡奇—阿梁岩画，并对卡利诺夫卡带有岩画的石头进行了描述。佐洛塔廖夫认为，后者是一个纪念遗址，以纪念一个未确定的古代民族（可能是博尔哈埃人）的一次远征（Okladnikov 1971: 11-12）。

1935年，奥克拉德尼科夫在首次对阿穆尔河流域进行调查期间，对锡卡奇—阿梁岩画（图5）进行了研究，并用拓印法复制了其中一些岩画（Miklashevich 2015）。在随后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其对锡卡奇—阿梁、谢列梅捷沃、基亚和卡利诺夫卡岩画点进行了全面记录，并在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进行了发表（Okladnikov 1959, 1968a, 1968b, 1971; 1977, 1981a, 1981b）。奥克拉德尼科夫确定了岩画的风格组别及其年代序列（表1）。他还利用从阿穆尔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对其进行了解读。自那时以来，该年代序列一直未被修订，并被认为是可靠的（Shevkomud 2004; Laskin 2015a），虽然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许多假设被证明是不成立的（表1）。近几十年来，许多相关的考古发现使得对这些估测的岩画年代进行修订成为可能。此前已经有人尝试过这种修订（Ponomareva 2015），结果表明，被称为“锡卡奇—阿梁组”（见下文）的一个重要岩画传统，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与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并不一致。阿穆尔岩画研究的最新进展（Devlet and Laskin 2014, 2015; Laskin 2007, 2014a, 2014b, 2015a, 2015b）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资料，本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些资料。

Quick Response Code



Access this article online

Website

<https://volksonpress.com/journal/jra/>

DOI:

10.65098/jra.02.2024.7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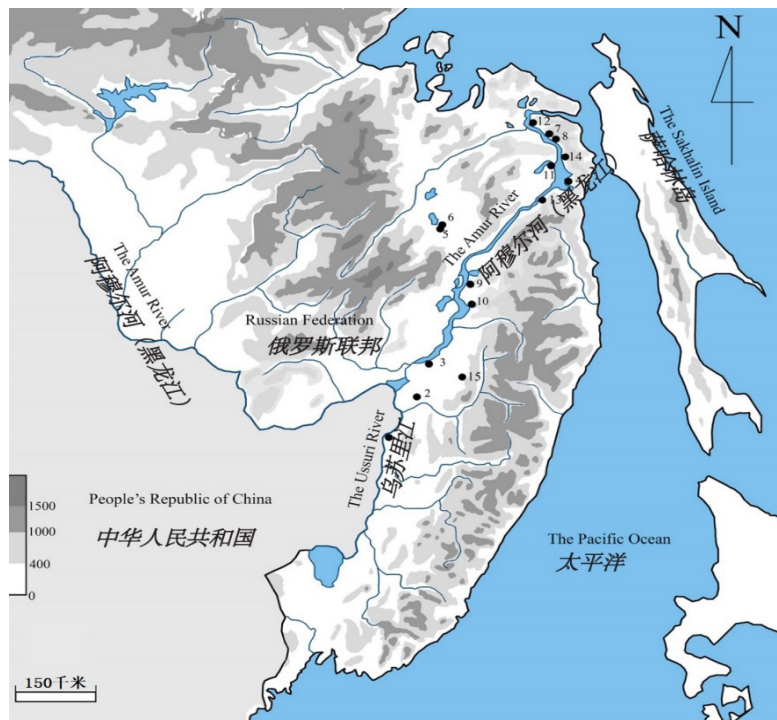


图1：文中提到的阿穆尔河流域的考古遗址

1. 谢列梅捷沃；2. 基亚；3. 锡卡奇—阿梁、马雷舍沃、加夏；4. 苏丘；5. 马依-5；6. 孔东；7. 苏萨尼诺-4；8. 马拉亚—加万；9. 沃兹涅谢诺夫卡；10. 因诺肯季耶夫卡；11. 科尔乔姆-3；12. 塔克塔；13. 卡利诺夫卡；14. 奥日；15. 苏克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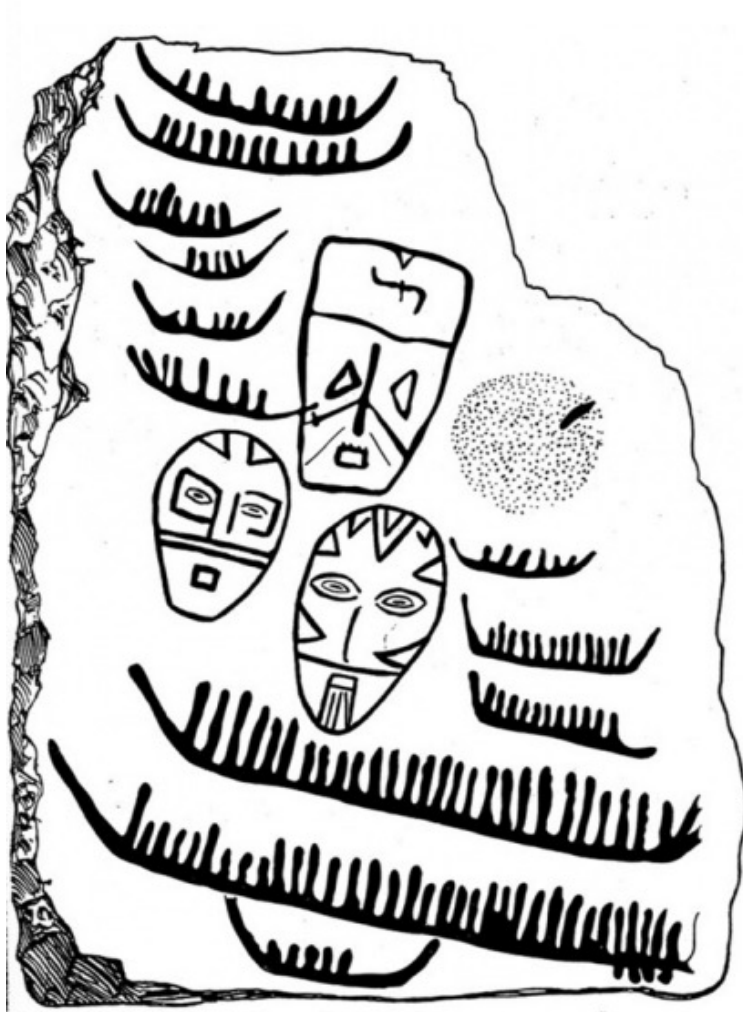


图2：卡利诺夫卡岩石，引自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图137）



图3: 谢列梅捷沃岩画群中带有岩画的垂直岩面, 3号地点全景



图4: 基亚岩画点垂直崖壁上的“面具/人面像”岩画



图5：锡卡奇—阿梁遗址群2号遗址一块巨石上的动物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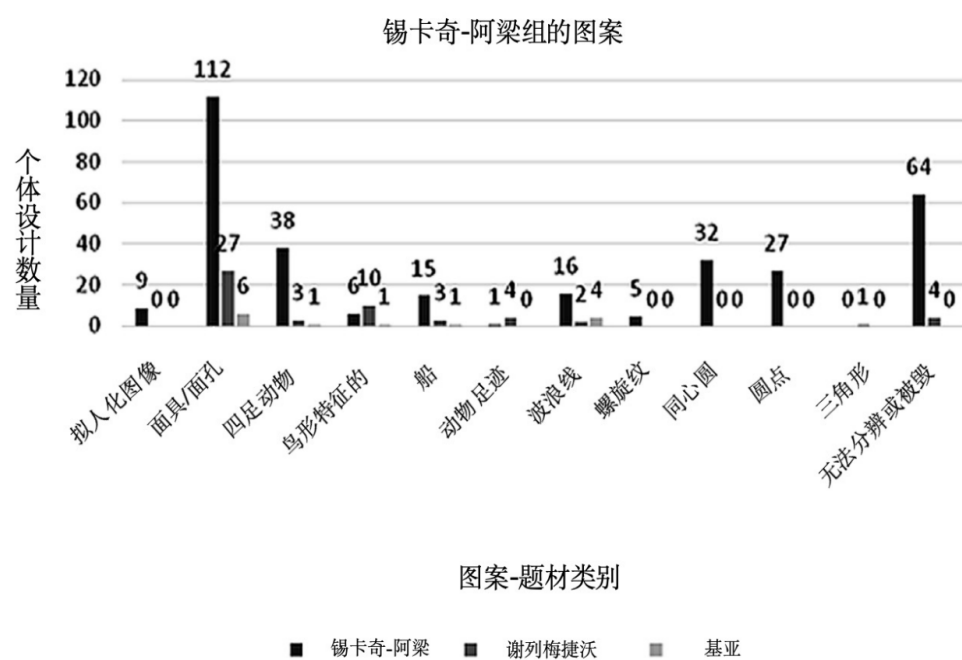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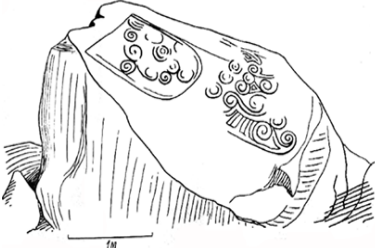


图6：锡卡奇—阿梁组的图像

表1：奥克拉德尼科夫制定的阿穆尔河下游岩画年表（1971）

	时期*	年代**	特点	地点	图像
1	中石器时代	距今10000至12000年	“原始的动物描绘技术和风格——麋鹿（可能是公牛）和马的形象”（Okladnikov 1971: 88） —森林鸟类 —简单的局部人面像 —骷髅人面像	在锡卡奇—阿梁遗址群1号遗址发掘的中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鸟形燧石雕像（图7，68）。然而，该出土文物的地层并不清楚，在距发掘坑25至30米处发现了风格相似的鸟类岩画，这些鸟类岩画位于一组动物图像中。 一人面像：一种假设，即巨石上倒置的岩画一定比同一巨石上正常位置的岩画更古老****	图示7，51-65、69 
2	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或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时期	公元前4千年末至公元前3千年 ¹	人面像的发展盛行 —雕刻的面具状人面像 —几何装饰的面具状人面像 —水鸟	在一些陶器碎片上发现类似的人脸描绘（图7，12、13）	图示10  没有提供人脸面具的图例
3	***	公元前2千年	更抽象、更具装饰性的面具状人面像和2幅带有螺旋纹的麋鹿图像	风格从写实到抽象的一个逻辑假设	图示7，44、45 没有展示面具面孔的图例
4	靺鞨时期	公元前1千年末至公元1千年初	卡利诺夫卡和锡卡奇—阿梁的雕刻面具类人面像和小船	用可能是金属的锋利工具雕刻而成	 图示2
5	中世纪时期	公元8至10世纪	刻划的动物图像，骑马者和拟人化图像	女真青铜器上的相似图像	

*由奥克拉德尼科夫确定的时期（1971）。

**年代未校准，沿用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制定的年表。相关的年代和时期，请参见年表部分和图7。

***对于这一组，奥克拉德尼科夫只提供了大致年代。

****然而，最近研究表明，带有岩画的巨石每年都会出现很大的位移（Laskin 201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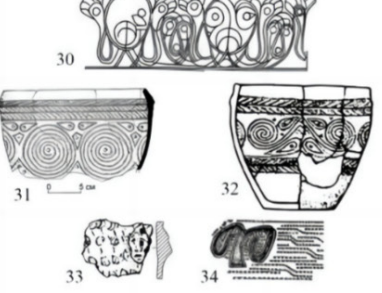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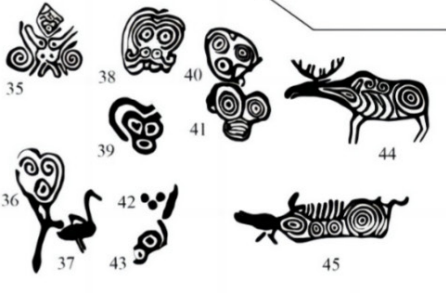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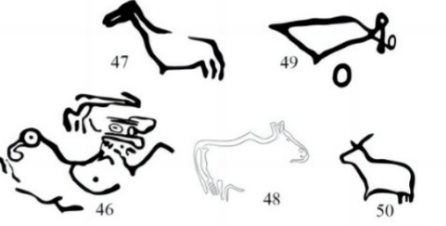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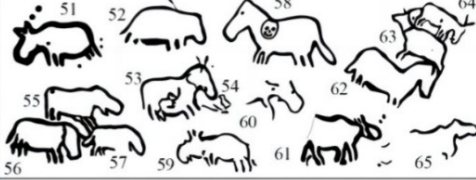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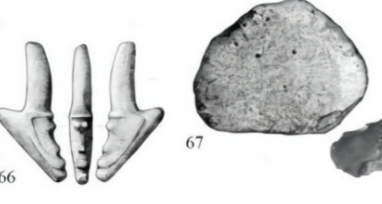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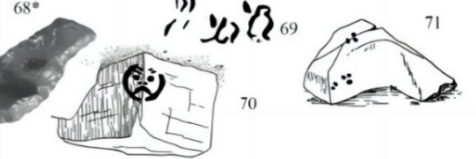
	考古出土文物	岩画	
伍德时期 距今4100-3700年			
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 距今4300-4000年			亚北方期 距今5000-2500年
马雷金沃文化 距今5300-4350年			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 距今8000-5000年
孔东文化 距今7700-6700年	一件尚未发表的带有人面像的陶片		北方期 距今9300-8000年
?	?		前北方期 距今10000-9300年
奥泰波夫卡文化 距今13300-10300年			更新世 距今10000年前

图7：初步尝试将阿穆尔岩画与考古学文化和气候时期联系起来³。由于库兹明2005年提供的气候分期年代是未经校准的，因此本表中的考古学文化日期也是未经校准的，并遵循舍夫科穆德和库兹明（2009年）的说法。动物名称具有幻象性、主观性和不可验证性（关于岩画解读中的幻象性，请参见贝德纳里克2016年的研究）。

便携式物品：1.因诺肯季耶夫卡（引自Konopatskiy 1985）；2.科尔乔姆-3（引自Shevkomud 2004）；9、10、15、16.孔东一波奇塔（引自Okladnikov 1984）；11.马拉亚—加万（引自Konopatskiy 1990）；12、13.沃兹涅谢诺夫卡（引自Okladnikov 1981b）；14、17.锡卡奇—阿梁（引自Okladnikov and Medvedev 1981）；30.马里-5（哈巴罗夫斯克地方历史博物馆）；31、32、33、34.苏丘（引自Filatova 2008）；66、67.贡恰尔卡-1（引自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68.锡卡奇—阿梁（出土情况不明，引自Okladnikov 1981b）。

岩画：3-5、36-38.谢列梅捷沃；6-8、18、20-29、35、39-65、69-71.锡卡奇—阿梁；19.基亚（引自Okladnikov 1971）。

动物性群组：6、7、28.“野猪”；8.“老鼠”；24.“喜马拉雅黑熊”；25、44、45、51、59、60、65.“驼鹿”；26、27.“琵嘴鸭”（一种鸭子）；46.“火烈鸟”；47.“西伯利亚雄鹿”；48、61.“公牛或野牛”；49.“琵鹭”；50.“斑羚”；53、55-57、58、62-64.“野驴或野马”（引自Velizhanin 1985）。

2. 锡卡奇—阿梁群组：特征和年代

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界定了阿穆尔岩画的两大类：锡卡奇—阿梁组和中世纪组。锡卡奇—阿梁组包括锡卡奇—阿梁、谢列梅捷沃和基亚岩画点发现的大部分阿穆尔岩画（第1-4阶段，见表1），这些岩画是用敲击法制成的，大部分似乎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本研究的重点是这组岩画，而不考虑中世纪岩画。在锡卡奇—阿梁岩画中，最常见的图像是“面具/人面”（见图6）。根据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的说法，这组图案还包括“鸟”、“蛇”（螺旋纹和波浪线）、“船”和“驼鹿或鹿”。

2.1 动物性描绘

在锡卡奇—阿梁组中，有42幅四足动物图像、16幅可能描绘水鸟和林鸟的鸟形图像、4幅动物脚印图像以及27幅螺旋纹和波浪纹图像，这些螺旋纹和波浪纹被之前的研究人员解释为蛇（图6）。其中30个物种已被“确定”（Velizhanin 1985），这增强了与气候周期的关联性。

奥克拉德尼科夫区分出一组古老的动物形岩画图像（表1，第1阶段），其中包括以巨大身体和凹背为特征的四足动物图像（图7，11、51-56）²。据推测，它们描绘的是“驼鹿”、“公牛或野牛”、“野驴或野马”和“斑羚”（Velizhanin 1985）。根据 A. G. 维利扎宁的说法，这些动物是适早、耐寒的动物，它们的形象是在阿穆尔河流域有草原、水位较低时绘制的。近期研究表明（Kuzmin 2005），这种环境可能出现在前北方期（距今10000至9300年）；气候分期的年代由库兹明2005年提供。

接下来一组包括适温动物，如“斑羚”和“西伯利亚雄鹿”或“公牛”，以及鸟类，如“琵鹭”和“火烈鸟”（图7，46-50）。这些鸟类是温暖潮湿气候的指示器（Velizhanin 1985）。气候变暖始于北方期，在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达到顶峰（Kuzmin 2005）。因此这组图像可能出现在距今9300至5000年前。

最后一组动物是通过主观辨认而确定的，包括阿穆尔地区的现代动物，如“驼鹿”、“老鼠”、“蝙蝠”、“鸭子”、“野猪”、“蛇”和“熊”（Velizhanin 1985）。这些形像（图7，6-8、24-29、44-45）可能出现在亚北方期（距今5000至2500年）（Kuzmin 2005）。由于上述推测的被描绘的动物群在该地区仍然存在，理论上这些形象可能是在当前气候时期制作的。

2.2 “面具/人面”设计

“面具/人面”图像在阿穆尔岩画中占主导地位，共计有145幅“面具/人面”图像（图6和图8）。它们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弧形耳饰。“眼睛”通常表现为同心圆，脸部的内部空间用装饰线填充，反复勾勒出脸部和眼睛的轮廓。不过，“面具”图像这一组别内部也存在多样性，“面具”在脸部轮廓形状、“眼睛”和“鼻子”形状以及内外装饰元素方面均有所区别。第一种分类法是由奥克拉德尼科夫于1971年提出的，尽管作者并不计划将其用于分析的目的，而仅仅用于对各种面部设计的描述方面。这种相对分类法是以脸部轮廓的形状为基础的，共定义了8种类型：椭圆形、卵形、心形、梯形、长方形、顶部为椭圆形而底部为直线形、猴形或颅骨形以及不完整形。叶莲娜·奥克拉德尼科娃（Okladnikova 1979）为了将阿穆尔地区的岩画与北美西北海岸的岩画进行比较，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法。她认为所有的面具/人面设计都是骷髅脸，并根据描绘主题的方式将其分为7组。在这些图像中，既包括心形图像，也包括有着不同眼睛的人脸。这种分类法成功地揭示了亚洲和美洲的古代居民世界观的共同点。不过，我们不能确定所有这些面具/人面像都是描绘头骨、面具和“类面具的”，也有可能是描绘的动物面部或其他东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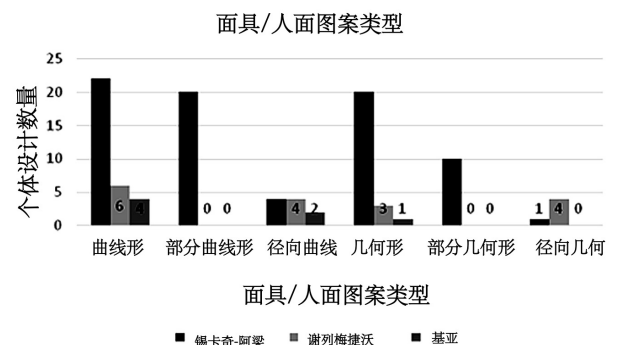


图8：面具/人面像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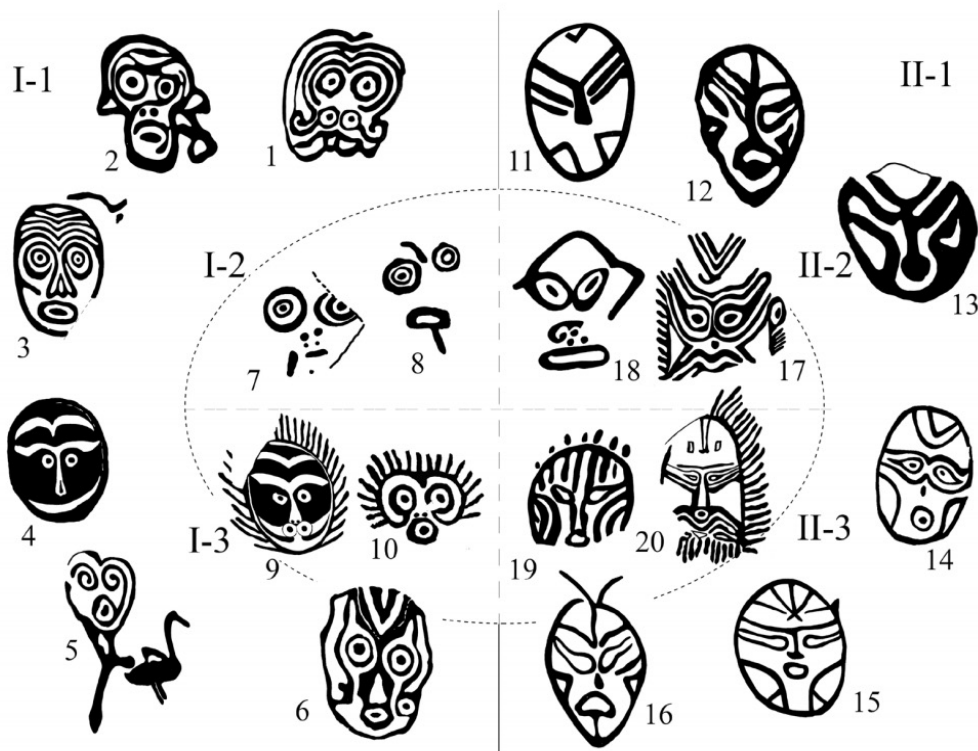


图9：面具/人面像设计类型：2、3、7、8、11-19.锡卡奇—阿梁；1、5、6、10、20.谢列梅捷沃；4、9.基亚（引自Okladnikov 1971）。

在此之前，笔者已经提出过另一种分类法（Ponomareva 2015）。这并非基于任何解释性的假设，而是建立在对装饰元素及其同时出现的分析基础之上。在此，我们将进一步对该分类法进行详尽阐述，并利用了最近发现的岩画资料（Devlet and Laskin 2014; Laskin 2007, 2014a, 2014b, 2015a）。该分类法旨在发现“人面像”设计结构中的共同模式，并将其与陶器上的装饰和“人面像”描绘进行比较。

阿穆尔“人面像”设计有两种主要类型：曲线型和几何型（图8和图9）。有人指出（Ponomareva 2015），人面结构的关键是“眼睛”形状。曲线形装饰大多出现在带有圆形“眼睛”的构图中，而几何形和棱角分明的线条往往与拉长的“眼睛”形状同时出现（图9，I）。拉长的眼睛形状包括拉长的椭圆形、水滴形、杏仁形和斜线形（图9，II）。曲线形人面设计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头骨”或“人面”的轮廓。几何形人面设计用更具风格的三角形和菱形线条勾勒出了轮廓。每种类型都有两个亚型，即带射线状头饰型（图9，I-3、II-3）和不完整型（图9，I-2、II-2）。带射线状头饰型人面像设计具有射线状线条这种外部元素，在曲线组和几何组中都能找到。存在着几幅成对出现的人面设计的例子，其中一幅岩画图像有射线状头饰，而另一幅却没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完整类型中，该类型制作出的是无轮廓“人面像”。

2.3 年代序列⁴

通过将岩画与陶片上的“人面”图像进行比较，我们之前已经对部分类型的人面像岩画年代进行过讨论（Ponomareva 2015）。类似的陶器图像来自马雷舍沃（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沃兹涅谢诺夫卡（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文化传统。由于描绘有“人面像”的陶器数发现数量很少，因此很难提供有关此类器物的整体的统计数据，目前仅发现了22件此类器物。本文综合了所有可用证据，如可移动艺术品、陶器以及岩画中动物的种属与气候时期的相关性，从而为阿穆尔岩画传统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年代序列（图7）。遗憾的是，没有对岩画的载体为崖面抑或是巨石进行记录。

新石器时代初期。俄罗斯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新石器时代始于陶器的使用。最早的此类证据来自奥希波夫卡文化，因此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产物。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约有70个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4200至前99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奥克拉德尼科夫在锡卡奇—阿梁遗址的奥希波夫卡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个鸟的鳍状雕像（Okladnikov 1971）（图7，68）。其他证据来自于奥希波夫卡文化的贡恰尔卡-1遗址（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两块带有3个小凹坑的卵石被发现，类似于对人面的简单描绘，其中两个凹坑被认为是眼睛，第三个是嘴巴（图7，67）。另一对手工制品，即所谓的“Y型物品”（图7，66）出土于同一个墓葬群中出土的，均由玄武岩制成，上面刻有拟人化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浮雕人面像是制作在石头的边缘处。人们注意到，这是阿穆尔岩画的一个特征（图7，70），因为有相

当数量的“人面像”岩画是制作在巨石的边缘处（Okladnikov 1971）。因此，这些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5千纪，奥希波夫卡文化艺术中就可能出现了简单的脸部图像以及在石头或巨石边缘描绘图像的具体方式。在临近滨海边疆区的谢克利耶沃-6遗址中也出土了两块带有简单面部刻画的卵石，其未校准年代为距今13000至8000年（Garkovik 2014）。有趣的是，其中一个是在卵石裂缝的边缘处制作而成的。奥希波夫卡文化存在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被认为是阿穆尔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其后各个时代的许多文化特征都源于这一文化综合体（Shevkomud 2004; 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

新石器时代早期。该地区可能曾被马林斯克文化占据，其年代为公元前7750至前58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然而，由于由特定石器和陶器组成的文化复合体仅出现于一个遗址（苏丘岛），并且器物位置受到扰乱，而其陶器与孔东文化和奥希波夫卡文化的陶器均具有相同特征，故而，马林斯克文化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因此，图7中不包括这种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包括孔东文化（早期阶段）和马雷舍沃文化（晚期阶段）两种考古学文化。该时代的特点是陶器上的图案装饰，其与滨海边疆区和满洲里的文化综合体有相似之处。孔东文化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和乌苏里江下游地区约有35个遗址。孔东文化早期为公元前6590至前5620年，晚期为公元前5310至前507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

根据物种测定和与气候时期的关联性，只有动物图像被归于这一时期（图7，46-65）。不过，这些岩画可能是在随后的马雷舍沃文化时期创作的，而马雷舍沃文化也存在于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人面像造像传统可能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部分证据表明了这一点。其中一幅与前北方期有关的动物形图像上制作了一幅人面像（图7，58）。另一个证据是2007年在孔东文化的雅泽·沃尔肯斯科耶-1遗址中发现的带有人面像的陶器碎片，但相关资料尚未发表（O.V.扬希娜提供）。

另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马雷舍沃文化，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有30个遗址。该文化早期的放射性碳测定法得到的年代数据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该文化占据了公元前4260至前2900年这一时期（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马雷舍沃陶器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曲线装饰、戳印图案和表面的红色颜料。还发现了拟人化的陶俑（Filatova 2008; 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 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其中5个例子展示了由两个交替的“人面”图案组成的装饰带，其中大多数都有几何和曲线两种“人面像”交替出现（图7，30、31、32；另见 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 52）。因此，这两类岩画都可能存在于马雷舍沃时期。此外，装饰性更强的图像，如用多线螺旋纹和同心圆装饰的图，似乎也应归于这一时期。



图10：锡卡奇—阿梁2号遗址巨石边缘的拟人化图像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阿穆尔河流域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为代表，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Shevkomud 2004；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早期为格林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至前26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该期与马雷舍沃文化密切相关。其陶器具有类似的特征，如梳印纹和“齿轮”印纹，器皿的各个部分都涂有彩绘，边缘装饰有直线和波浪形卷纹，图像以蜿蜒线、螺旋线、“面具”和同心圆为基础（Filatova 2008；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不过，从陶器上的人面设计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这些图像看起来更加逼真（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在马雷舍沃文化中，它们被纳入装饰带中，从而与陶器的封闭表面结合在一起。而在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中，人面设计是组合结构的核心元素（图7，12、13）。“人面像”的构图不是由重复的曲线构成的，而是完整的图像，这些图像在阿穆尔岩画中可以找到直接的类似案例（图7，18-23）。

下一个阶段是伍德德时期，年代为公元前2600至前22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学者们注意到，可能存在源自萨哈林岛的外来陶器传统的迹象（Shevkomud 2004）。

大多数刻有“人面像”的陶器碎片都发现于早期的格林期。不过，在中期的伍德德期发现了两块碎片（图7，1、2）。

晚期的马洛加万期年代为公元前2200至前17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虽然延续了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的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陶器完全不同（Shevkomud 2004）。在该期的陶器以及其后的陶器中，均未发现任何人面像。最后一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科宾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至前9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然而，对新石器时代和“古金属”⁵时代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制作于公元前2千纪的岩画，但根据维利扎宁的解释，一些描绘有“驼鹿”、“野猪”、“喜马拉雅黑熊”和“老鼠”等现代动物的变形图像可能出现在亚北方期（Velizhanin 1985）（图7，6-8、24-29、44-45）。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1981a）认为，卡利诺夫卡岩石上的人面像和许多“船形图像”都是用一种锋利的、可能是金属的工具刻上去的（因此他将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年代定为古金属时代），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存在可能表明，“人面像”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来自萨哈林岛移民的出现而停止。然而，自1968年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工作（Okladnikov 1981a）以来，该幅岩画一直没有被找到，也没有它的精美照片。此外，在今天阿穆尔人的传统装饰品中，还可以看到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传统的遗迹（Okladnikov 1959）。

3. 连续性：体系化结构

阿穆尔岩画似乎提供了一个在新石器时代以“面具/人面”图像为主的历时颇长的岩画传统的例子。这一传统存在于3个遗址中，锡卡奇—阿梁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这种独特的题材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民族、身份、社会实践、象征主义和社区。

民族性是一种非常难以捉摸且备受争议的现象，而阿穆尔新石器时代岩画可能并非如此。然而，民族性就是要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并在跨文化交际中保持和显示这种独特性。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在许多人类学家看来，民族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参与者的文化独特性会在正常的互动中产生影响（Eriksen 2010: 16-17；Jenkins 1997: 13）。正如巴恩所说，文化差异可能是种族边界维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Barth 1969: 12）。虽然族际关系意味着对立和对比，但这种互动既意味着差异，也意味着相似（Jenkins 1997: 13），因为必须有“族际话语和互动的共同领域”才能进行交流（Eriksen 2010: 33-34）。岩画点可以作为族群之间交流的“共享熔炉”，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一些艺术元素。在一些岩画点中，还发现了另一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群组，它与公元前5200至前4100年间雅库特的贝尔卡奇文化有关（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这一群组代表着人群从阿穆尔地区北部甚至阿尔丹—勒拿河流域迁徙而来。尽管人们对贝尔卡奇文化复合体在阿穆尔文化起源中的作用还不甚了解，但一些动物形描绘可能是受来自雅库特的影响而产生的，它们在那里的新石器时代岩画图像中占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阿穆尔河流域的文化与满洲里和滨海边疆区的文化积极互动，可以在下阿穆尔河流域划分出两个接触区，即西南接触区和东北接触区（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因此，尽管断言新石器时代阿穆尔地区就出现了民族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这种复杂的多元文化状况的存在，表明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存在，即了解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并通过积极战略性地利用岩画来保持这种独特性。

由于阿穆尔河流域仅有3个新石器时代岩画群，而锡卡奇—阿梁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此这里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可以作为该

地区族群的长期聚集地。新石器时代的风格有所变化，但贯穿所有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像”。我们无法揭示该图像的真正含义，但至少可以展现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这个图像可能扮演着一个有意义的知识库，尽管这个知识库的意义可能一代又一代地发生变化，但它是保持社区与过去和本土联系的思想源泉。因此，锡卡奇—阿梁以及其他岩画点可以创建并维护阿穆尔河流域社区的象征性边界。

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P·科恩1985年研究了边界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区边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人们的意义是什么（Cohen 1985: 12）。科恩认为社区是一种心理建构：“社区的现实在于其成员对其文化活力的感知。人们以象征的方式构建社区，使其成为意义的资源和宝库，并成为其身份的参照”（Cohen 1985: 118）。边界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科恩强调的是边界和社区的意义，而不是其结构形式。在形式连续性和内容实质性变化的例子中，他展示了结构如何可能相似但隐藏着不同的现实（Cohen 1985: 98）。遗憾的是，在阿穆尔岩画中只能观察到持续存在的结构，不可能揭示其不断变化的含义。不过，岩画点可能是宗教生活的集中地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因此可以认为岩画点具有象征意义。

仪式是突出的象征手段之一，因为它能给人带来共同性的体验，从而有效地维护边界，使人产生与他人的共同感和差异感。仪式场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科恩区分了仪式交流的两个层面：首先，仪式交流的是群体与他人的关系；其次，仪式交流的是个人与其群体和世界的关系，因此，“仪式既构建了社会边界，同时也让个人体验到社会边界”（Cohen 1985: 53-54）。根据对加夏（靠近锡卡奇—阿梁）、沃兹涅谢诺夫卡、苏丘和塔赫塔遗址的发掘，人们认为阿穆尔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至少存在4个崇拜中心（Medvedev 2005）。遗址某些部分为非实用目的，主要标志是集中了陶质和石质便携式“艺术”品、装饰品以及被解释为用于仪式的高品质、装饰丰富的陶器。所有这4个崇拜中心都与马雷舍沃和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层有关，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圣地的创建可能始于锡卡奇—阿梁的奥希波夫卡时期，那里也是该地区的主要岩画点。其他岩画点，如谢列梅捷沃、基亚和发现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崇拜中心，未来的考古调查应检验这一点（Medvedev 2005）。“人面像”题材的仪式作用可以通过对其强调的“眼睛”的解释得到说明，“眼睛”显示的是服用致幻剂后的状态。民族学家曾描述过远东民族的这种做法（Tabarev 2012）。

社区与岩画点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岩画点作为意义的载体，有助于创造和维护社会身份，同时也面临着变化和外来影响。例如，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岩画就发生了变化。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只有简单的“人面像”，可能还有一些动物形图像。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动物形图像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装饰主义开始盛行，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出现了更多的写实图像。因此，在变化的同时也有连续性。岩画点的功能似乎可以与布迪厄在其实践理论中提出的“习性”概念相比较（Bourdieu 1977）。习惯构成了实践，同时又被实践所构成，这一观点可用于理解岩画点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习惯性倾向为可能的替代方案划定了界限，同时又处于永久的流动和变化之中，这正是岩画风格发展的体现。即使有变化，也是从有限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尽管人面像设计千变万化，但其结构模式却非常清晰。物质文化被反复用来体现民族性，而对特定形式或风格的选择则受到习惯下的结构性限制（Jones 1997: 120）。

4. 结论

阿穆尔新石器时代岩画传统有3个地点，其中锡卡奇—阿梁岩画点因岩画的数量和多样性可被视为主要地点。锡卡奇—阿梁岩画群以“人面像”为主，但也有许多动物图像。这里提供的证据表明，锡卡奇—阿梁人群经历了一万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初步确定每个阶段的一些特征。

与奥希波夫卡时期有关的岩画可能包括一些简单的“人面像”和“鸟图像”。尽管“人面像设计传统”继续存在，但一个相当单一的动物形群组显然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期，装饰主义兴起，表现在陶器和岩画上。在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尽管“人面像”的设计往往不那么具有装饰性。尚无一个风格独特的动物形群组可以与某个特定时期联系起来。只有两件驼鹿纹饰因其螺旋形装饰而引人注目（图7，44、45），因此，它们可能与马雷舍沃时期有关。岩画传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可能并未停止，尽管除了卡利诺夫卡岩画之外，尚无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丰富的装饰传统历经万年而不衰，在现代阿穆尔人的艺术和工艺品装饰中可以看到其残余。我们试图为阿穆尔岩画建立一个年代模型，但这只是实验性的、临时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的。不过，它是完全可以检验的，并且是科学的，毫无疑问，未来的科学测年工作也会对其进行检验。

人类学视野对阿穆尔岩画传统的长期性和持久性的研究为了解岩画点在史前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些线索。阿穆尔河下游是一个文化交流区，这可能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出现，岩画点也可能成为族群之间“共同的话语和互动场所”。大量类似的设计表明艺术活动的重复，这可能是仪式活动的证据。因此，这些岩画点，尤其是“人面像”主题，可能被用作建设社区、建立和维护社区边界的象征性工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和艺术品的含义会发生变化。岩画风格的发展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岩画点作为有力量和有意义的地方，以及岩画作为文化独特性的表现形式，是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同时也是由社会身份构成的。

致谢

感谢奥克萨娜·扬希娜（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她对岩画与考古文物的关联性提出的有益批评。我非常感谢保罗·S.C.塔松教授（格里菲斯大学）对本文的深入阅读和修改。我还要感谢《岩画研究》的匿名审稿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对本文进行了完善。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波诺马列娃

c/o 菲欧娜·麦基格

G06 2.19C人文、语言和社会科学学院

格里菲斯大学黄金海岸校区

南港，昆士兰4222

澳大利亚

irina.ponomareva@griffithuni.edu.au

ponomaroshka@mail.ru

注释

1. 译者注：原文写的是“公元前3千年至公元前4千年末”，按照中文表达习惯翻译时将其年代改为公元前4千年末至公元前3千年。

2. 译者注：这里的图7，11为人面像，而非作者所谓的动物图像，可能为笔误。

3. 译者注：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作者对该图进行了更新，增加了一件孔东文化时期的人像，其五官与部分人面像类似，因此，作者将部分人面像岩画归入孔东文化时期。参见Ponomareva I. 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rehistoric Rock art of East Siberia. An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into ethno-cultural identity, belonging, and symbolism*. Oxford, BAR Publishing, 2021, pp82-83.

4. 本节中考古学文化通过放射性碳测定法得到的年代数据是来自于舍夫科穆德和库兹明的研究（2009年）。根据上述作者的说法，这些数据是用Calib Rev 5.0.1校准的。更多详情，请参见舍夫科穆德和库兹明2009: 8-9。然而，在图7中，为了与库兹明（2005年）提供的未经校准的气候期日期相比较，考古文化的日期是未经校准的。

5. 该术语是由V. A.戈洛佐夫于1927年提出的，在俄罗斯许多地区，当难以区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时，该术语就被用来指代这两个时代。在阿穆尔地区，青铜器的出现与铁器的出现同步，时间为公元前11—前10世纪。这些罕见的发现无法让研究人员重建冶金的发展。因此，在阿穆尔地区，“古金属（Palaeometal）”一词用来描述地区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同时包括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Arutyunov et al. 1982; Yanshina 2013）。

参考文献

Arutyunov, S. A., A. V. Aleksandrov and D. L. Brodyanskiy 1982. *Paleometal Severo-Zapadnoy chasti Tikhogo okeana [The Palaeometal Age of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DVGU, Vladivostok

Barth, F. 1969. Introduction. In F.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p. 9–38.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Bednarik, R. G. 2016. Rock art and pareidolia. *Rock Art Research* 33(2): 167–181.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ohen, A. P.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D'yakov, V. I. 1978. Sukpayskaya pisanitsa [The Sukpai rock art site]. In A. I. Krushanov (ed.), *Arkheologicheskie materialy po drevney istorii Dal'nego Vostoka SSSR*, pp. 31–32. DVNTS AN, Vladivostok.

Devlet, E. G. and A. R. Laskin 2014. K izucheniyu petroglifov Amura i Ussuri [On investigations of rock art of the Amur and Ussuri rivers]. *Kratkiye soobshcheniya Instituta arkheologii – KSIA (Brief Commun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32: 8–29.

Devlet, E. G. and A. R. Laskin 2015. Petroglyphs of Khabarovsk Territory: the impact of the 2013 Amur and Ussuri flooding.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3(4): 94–105.

Eriksen, T. H. 2010.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luto Press, London.

Filatova, I. V. 2008. Ornamental traditions of the lower Amur Neolithic.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4(2): 88–95.

Fowke, G. 1906. Exploration of the lower Amur valle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2): 276–297.

Garkovik, A. V. 2014. Izobrazitel'naya deyatel'nost' drevnego naseleniya Primor'ya [The art of the pre-Historic Maritime Territory]. In *Arhaicheskoe i tradicionnoe iskusstvo: problemy nauchnoy hudozhestvennoy interpretatsii: materialy Vserossiyskoj (s mezhdunarodnym uchastiem) nauchnoy konferencii*, pp. 19–25. Izd-vo In-ta arheologii i ehntografii SO RAN, Novosibirsk.

Gorodtsov, V. A. 1927. *Tipologicheskij metod v arkheologii [Typological method in archaeology]*. Publisher not indicated, Ryazan'.

Jenkins, R. 1997. *Rethinking ethnicity*, Sage, London.

Jones, S. 1997.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Routledge, London.

Konopatskiy, A. K. 1985. Obsledovanie na nizhnem Amure [Investigation in the lower Amur basin]. In R. M. Munchaev (ed.), *Arkheologicheskoe otkrytiya 1983 goda*, pp. 209–210. Nauka, Moscow.

Konopatskiy, A. K. 1990. Unikal'noe proizvedenie iskusstva epokhi neolita na nizhnem Amure [Unique Neolithic artwork in the lower Amur basin]. In *Semantika drevnikh obrazov. Pervobytnoe iskusstvo*, pp. 21–34. Nauka, Novosibirsk.

Kuzmin, Y. V. 2005. *Geokhronologiya i paleosreda pozdnego paleolita i neolita umerennogo poyasa vostochnoy Azii [Geochronology and paleoenvironment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Neolithic of temperate east Asia]*. Pacific Institute of Geography, Vladivostok.

Laskin, A. R. 2007. The rock art of Sikachi-Alian: future study and preservation.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0(2): 135–142.

Laskin, A. R. 2014a. Novye rezul'taty issledovaniy pamyatnikov drevnego naskal'nogo iskusstva v bassejne rek Amura i Ussuri v Khabarovskom krae: problemy sokhraneniya i ispol'zovaniya [New results of the studies of the rock art sites in the basins of the Amur and Ussuri rivers in Khabarovsk Territory: the problems of preservation and usage]. In *Trudy IV (XX) Vserossiyskogo arkheologicheskogo s'ezda*, pp. 65–68. Otechestvo, Kazan'.

Laskin, A. R. 2014b. O rezul'tatakh obsledovaniya petroglifov Sikachi-Al'yana i Sheremet'eva v 2014 g [The results of the examination of the

- Sikachi-Aluan and the Sheremetyevo petroglyphs in 2014]. *Kratkiye soobshcheniya Instituta arkheologii – KSIA (Brief Commun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36: 82–86.
- Laskin, A. R. 2015a. Petroglify Sikachi-Alyana: istorikokul'turnyy kontekst i sostoyaniye sokhrannosti [The Sikachi-Alyan petroglyph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state of preservati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RAS, Moscow.
- Laskin, A. R. 2015b. Iz istorii issledovaniy arkheologicheskikh pamyatnikov v okrestnostyakh sel Sikachi-Alyan i Malyshevo (Khabarovsk Territory) [On the history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villages Sikachi-Alyan and Malyshevo (Khabarovsk Territory)]. *Problems of History, Philolog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Phil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3: 245–252.
- Laufer, B. 1899. Petroglyphs on the Amo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4): 746–750.
- Medvedev, V. E. 2005. Neolithic cult centers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4(4): 40–69.
- Medvedev, V. E. and I. V. Filatova 2014. *Keramika epokhi neolita nizhnego Priamur'ya (ornamental'nyy aspekt) [Lower Amur Late Stone Age ceramics (ornamental aspect)]*. Izd-vo IAET SO RAN, Novosibirsk.
- Miklashevich, E. A. 2015. Estampages of the Amur petroglyphs from A. P. Okladnikov's expedition in 1935. *Problems of History, Philolog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Phil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4: 5–25.
- Okladnikov, A. P. 1959. Drevnie amurskie petroglify i sovremennaya ornamentika narodov Priamur'ya [Ancient Amur petroglyphs and modern ornaments of the Amur peoples]. *Soviet Ethnography* 2: 38–46.
- Okladnikov, A. P. 1968a. Iz predystorii iskusstva amurskikh narodov (petroglify na r. Kiya, Ussuri) [Prehistory of the art of the Amur peoples (petroglyphs of the Kiya at the Ussuri River)]. *Soviet Archaeology* 4: 46–57.
- Okladnikov, A. P. 1968b. *Liki drevnego Amura [Faces of the prehistoric Amur River]*. Zapadno-Sibir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Novosibirsk.
- Okladnikov, A. P. 1971. *Petroglify nizhnego Amura [Petroglyphs of the Lower Amur]*. Nauka, Leningrad.
- Okladnikov, A. P. 1977. Vzaimodeystvie drevnikh kul'tur Tikhogo okeana (na materialakh petroglifov) [Interaction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region (based on rock art)]. In *Problemy arkheologii Evrazii i Severnoy Ameriki*, pp. 41–49. Nauka, Moscow.
- Okladnikov, A. P. 1981a. Petroglify u s.Kalinovka na Nizhnem Amure [Petroglyphs near the village Kalinovka in the lower Amur basin]. In *Yazyki i fol'klor narodov Severa*, pp. 12–18. Nauka, Novosibirsk.
- Okladnikov, A. P. 1981b. *Ancient art of the Amur region: rock drawings, sculpture, pottery*. Aurora Art Publishers, Leningrad.
- Okladnikov, A. P. 1984. *Keramika drevnego poseleniya Kondon (Priamur'e) [The ceramics of the Kondo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Amur region)]*. Nauka, Novosibirsk.
- Okladnikov, A. P. and A. P. Derevyanko 1973. *Dalekoe proshloe Primorya i Priamurya [The remote past of the Maritime Territory and the Outer Manchuria]*. Dalnevostochnoe knizhnoe izdatel'stvo, Vladivostok.
- Okladnikov, A. P. and V. E. Medvedev 1981. Raskopki v Sakachi-Alyane [Excavations in Sakachi-Alyan]. In *Arkheologicheskie otkrytiya 1980 goda*, pp. 201–203. Nauka, Moscow.
- Okladnikova, E. A. 1979. *Zagadochnye lichiny Azii i Ameriki [Enigmatic faces of Asia and America]*. Nauka, Novosibirsk.
- Ponomareva, I. A. 2015. Petroglyphs in the Amur region: face types and their dating. *Arnava* 4(1): 91–113.
- Popov, I. V. 1969. Amur. In *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pp. 1: 544. Soviet Encyclopedia, Moscow.
- Shevkomud, I. Y. 2004. *Pozdnyy neolit nizhnego Amura [The Late Neolithic of the lower Amur region]*. DVO RAN, Vladivostok.
- Shevkomud, I. Y. and Y. V. Kuzmin 2009. Khronologiya kamennogo veka Nizhnego Priamur'ya (Dal'niy Vostok Rossii) [The chronology of the Stone Age in the Amur region]. In I. Y. Shevkomud (ed.), *Kul'turnaya khronologiya i drugie problemy v issledovaniyakh drevnostey vostoka Azii*, pp. 7–47. KHNTS DVO RAN, Khabarovsk.
- Shevkomud, I. Y. and O. V. Yanshina 2012. *Nachalo neolita v Priamur'e: poselenie Goncharka-1 [The beginning of the Neolithic in the Amur region: settlement Goncharka-1]*. MAE RAN, St Petersburg.
- Tabarev, A. V. 2012. Zmei, maski i tantsuyushhie shamany: na perekrestkakh neoliticheskikh mirov drevney pasifiki [Serpents, masks and dancing shamans: on the crossroads of the Neolithic worlds in the Pacific]. In *Dal'nevostoch-no-sibirskie drevnosti: sbornik nauchnykh trudov, posvyash-hennyy 70-letiyu so dnya rozhdeniya V. E. Medvedeva*, pp. 96–103. Izd-vo In-ta arkheologii i etnografii SO RAN, Novosibirsk.
- Velizhanin, A. G. 1985. Oblik fauny Priamur'ya v naskal'nykh risunkakh [The fauna of the Amur region in rock art]. *Priroda*, (1): 90–93.
- Yanshina, O. V. 2013. Epokha paleometalla v Priamur'ye: problemy i perspektivy issledovaniy [Early Metal Period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Rossiyskiy arkheologicheskiy ezhegodnik* 3: 289–335.

